

天主教傳教士來華 與明清之際西畫東來

葉 農*

明清之際，繪畫交流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內容。其中，西畫東來中國又是繪畫交流的組成部分。最早開始進行這項交流的人是從明中葉開始來華從事傳教工作的天主教傳教士。關於這個問題的研究，已有許多研究成果⁽¹⁾，但這些研究成果仍然存在着許多不足之處：對將西洋繪畫傳入中國的傳教士的研究主要着重於後期來華的清宮廷內傳教士畫家；對西洋繪畫來華途徑研究不足。

西畫，即西方繪畫，是指16世紀之後，以意大利為代表的西方美術。本人認為它有三層涵義：第一，指的是西方的繪畫作品，特別是天主教的宗教畫；第二，指的是西方畫家；第三，指的是西方的繪畫理論。西畫是作為天主教的傳教手段及工具，隨同傳教士而來到中國的。西畫東來始於明萬曆年間，隨着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而逐漸進入了一個高潮，後又隨着清政府的不斷禁教，天主教在華傳教困難而於清乾隆之後陷入一種停滯狀態。故本文以此為研究的時段。由於西畫東來這個問題涉及面較廣，涉及的問題亦較多，為研究的方便，本文主要探討兩個問題：一是繪畫作品的傳入途徑，一是來華的傳教士畫家。如有不足之處，請各位專家學者指正。

明清之際西畫東來的一些途徑

西方的繪畫作品傳來中國，並不是西方藝術家們單純地想把西方的繪畫藝術傳入中國，而是先作為天主教傳教士的傳教工具來華的。這從客觀上起到了促進西畫東來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傳教士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通過研究史料，我們可以發現，西畫通過了以下的途徑來到中國。

一、由傳教士們攜來中國。傳教士，特別是早期來華的傳教士，為了傳教方便和宗教信仰，他們來華時，多攜有一定數量的宗教畫。從現有史料來看，最早的應該是方濟各會會士阿爾法羅（Pierre Alfaro，西班牙人，？-1580）等攜帶宗教畫來到廣

東肇慶。阿爾法羅是該會首名來華傳教士，他於明萬曆七年（1579）來到廣東的肇慶。在他的行李中，就有手繪聖像。據（法）裴化行稱：

及至〔1579年〕8月21日，他們〔阿爾法羅等〕又到肇慶過堂。〔兩廣〕總督檢點他們攜帶的物品時極其高興。其中（……）還有幾張筆致精妙，五光燦爛的手繪聖像。⁽²⁾

最早來到肇慶傳教的意大利籍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亦曾攜來宗教畫。據金尼閣說：“〔肇慶〕百姓（……）詫異地望着聖母的小像。”⁽³⁾

除獨立的繪畫作品外，在其攜帶的書籍中亦有繪畫作品。據（明）顧起元著《客座贅語》載：“〔利

*葉農，廣州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副研究員。

瑪竇〕攜其國所印書冊甚多，（……）間有圖畫人物室宇。”⁽⁴⁾明萬曆二十六年（1598），意大利籍耶穌會士龍華民（Nicolas Longobardi, 1559-1654）曾致書歐洲，稱中國人喜愛西洋畫，請多寄畫像來華，作為傳教的工具。故利瑪竇以後來華的傳教士，多攜有西洋宗教畫。

明天啟元年（1621），法國籍耶穌會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從歐洲重返中國，他攜帶有巴伐利亞諸公爵所贈繪畫。據（法）費賴之（Louis Pfister, S. J.）說：

巴伐利亞國諸公爵以所藏最貴重之繪畫與異物贈之，（……）諸傳教師見尼閣至，攜來諸基督教君主之贈品，（……）皆大歡欣。⁽⁵⁾

在南京，意大利籍耶穌會士畢方濟（Franciscus Sambiasi, 1582-1649）興建教堂時，在堂內繪有宗教畫。據費賴之說：

1641年方濟在南京城內某山上為天使建一教堂，（……）堂內用西洋畫法繪一圖，附以說明，右為善天使圖，分天使為九種；左為墮入地獄之惡天使圖。教內教外人見圖新異，爭往觀之，因而不乏受洗者。⁽⁶⁾

在直隸，有葡萄牙籍耶穌會士傅作霖（Felix da Rocha, 1713-1781）和奧地利籍耶穌會士劉松齡（Augustin von Hallerstein, 1703-1774）攜來宗教畫散發給在此的教徒。據費賴之稱：

1747年教難時代，有人訴於巡撫，謂作霖與劉松齡表散十字架、圖像、念珠等物。⁽⁷⁾

在四川，明清更替之際，葡萄牙籍耶穌會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 1609-1677），其攜帶的書籍中亦有宗教畫。據費賴之說：

後在漢中有一回教徒，以文思之《聖務日課》交還，蓋其人得此本，見上有外國字及聖像，疑其為歐羅巴人所有，故見還。⁽⁸⁾

在浙江，意大利籍耶穌會士衛匡國（Martino Martini, 1614-1661）曾用所攜之宗教畫臨時佈置聖壇，以阻止清兵襲擊。據費賴之說：

韃靼取杭州時，匡國在距杭不遠之 Wen-Choei，寓一大宅中。尚有數人避難此宅（……）及聞韃靼兵至，匡國題其門曰：“泰西傳佈聖法士人居此”。將所攜之書籍，望遠鏡及其他諸異物陳列桌上，於中設壇，上掛耶穌像。⁽⁹⁾

在湖廣，1662年楊光先教案發生後，在此處的法國籍耶穌會士穆迪我（Jacques Motel, 1618-1692）被解往北京前，就曾將其經像藏起來。如費賴之說：“迪我於是藏其經像祭物，遵陸北行。”⁽¹⁰⁾此處的經像即宗教畫。

二、作為天主教傳教場所，特別是教堂的裝飾來到中國。天主教傳教士在華建造的教堂、住院為了增加宗教氣氛等目的，一般均有宗教畫進行裝飾。這也是西方繪畫東來的最初與最主要的目的。而且，它隨着教堂、住院在中國許多地方的建立，這些繪畫作品亦分佈到中國許多地方。

由於廣東地區是天主教最早傳進中國的地區，故西方繪畫作品亦最早傳入，其時間在明嘉靖四十二年（1564年1月底），當時葡萄牙來華使節團在澳門一帶活動，兩名隨團來華的傳教士來到今屬香港地區的大嶼山為在此活動的葡萄牙人進行宗教服務，接受服務的葡萄牙人曾專門修建了一座臨時教堂，堂內就懸掛着一幅宗教畫。據隨團的三名傳教士之一的平托修士稱：

我們從 Amacau 這個港口出發，兩天後到

達這個 Pinhal 島〔即大嶼山島〕。(……)次日禮拜日，所以我們對他們說，我們已準備好為他們做彌撒。於是他們當中有些人就登了岸，就在半夜三更在海灘上搭起了一座教堂。(……)到天亮時，樹枝搭成的、有旗子裝飾的教堂也出現了。連供祭 orago〔聖徒〕的祭壇裝飾畫也不缺，因為雖然沒有裝飾畫，還是擺上了聖米迦勒的一幅畫像。這樣，就修起了 Pinhal 的聖米迦勒教堂。(11)

此後，當利瑪竇在肇慶建成中國第一座住院時，內部亦有宗教畫裝飾。如金尼閣說：

所謂的傳教室在兩頭各有兩間房，中間是間空屋，用作教堂，中央是聖壇，上面掛着聖母畫象。(12)(而懸掛它，亦有利於宗教氣氛的形成。)當人們去訪問神父時，官員和其他擁有學位的人、普通百姓乃至那些供奉偶像的人，人人都向聖壇上圖畫中的聖母像敬禮，習慣地彎腰下跪，在地上叩頭。這樣做時，有一種真正宗教情緒的氣氛。他們始終對這幅畫的精美稱羨不止，那色彩，那極為自然的輪廓，那栩栩如生的人物姿態。不久就清楚，由於種種原因，最好把聖母像從聖壇上取下來，換上救世主基督的像。(13)

在明萬曆二十三年(1595)利瑪竇離開韶州前往南昌等地後，天主教開始傳播到中國的其它省份，而西方繪畫作品亦隨此北傳。各省情況如下：

在北京，在日本出生的華人耶穌會會士倪雅谷(Jacques Neva, 1579-1638)在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為北京教堂複製了一幅聖路加聖母像。北京的教堂建成後，其內部的裝飾畫受到中國人的好評。據(明)劉侗《帝京景物略》載：

〔利瑪竇〕邸左建天主堂，(……)供耶穌像其上。畫像也，望之如塑，貌三十許人，左手把渾天圖，右叉指若方論說。指所說者，鬚眉豎者如怒，揚者如喜，耳隆其輪，鼻隆其準，目容有矚，口容有聲，中國畫繪事所不及。右聖母堂，母貌少女，手一兒，耶穌也。衣非縫製，自項被體，供具如左。(14)

他在明萬曆三十九年(1611)被派遣來北京為利瑪竇安厝祠堂繪製壁畫。清初順治年間，北京城郊有教堂，大堂七所，小堂十四所，它們內均飾有宗教畫。這從楊光先教案發生後，北京的大小教堂被封，宗教畫被摘走可見。據“費書”載：教案發生後北京“教堂盡被封閉，圖像盡被摘取”(15)。康熙三十九年(1700)，法國籍耶穌會會士張誠(Jean 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在京奉旨修建天主教堂(“北堂”)，教堂內部有繪畫裝飾，所附房屋中的客廳，亦有人物像裝飾。據“費書”載：

教堂(……)天花板皆加繪飾，祭壇後部亦加彩繪，華人見者咸目迷五色。(……)祭壇裝飾極為華麗，皆路易十四世寄贈之物也。教堂兩旁建華式廳屋二所。(……)客廳之中懸掛法國國王、王世子、諸親王、西班牙和英吉利等國國王諸繪像。(……)華人見者莫不驚異。(16)

至康熙末年，意大利籍耶穌會士、畫家郎世甯(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亦曾為天主教“東堂”擴建時作過內部美術和裝璜設計，畫有〈君士坦丁賴十字徽號得勝圖〉和〈君士坦丁大帝作戰圖〉兩幅圖；後又為天主教“南堂”的聖若瑟學院大廳作天頂圖。乾隆四十一年(1776)，意大利籍耶穌會會士畫家潘廷璋(Joseph Panzi, 1733-1812)又為“東堂”繪〈聖母無原罪像〉。費賴之說：“1776年為葡萄牙神甫重建之教堂繪聖孕圖，高十一尺，寬

八尺。”⁽¹⁷⁾

在江西，倪雅谷於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被派遣到南昌為一座教堂繪製壁畫。⁽¹⁸⁾於該省傳教的法國籍耶穌會會士聶仲遷(Adrien Greslon, 1614-1695)，在楊光先教案發生後，他知道其教堂難保，在1664年將教堂中的經像等隱藏。據“費書”載：“知縣待我甚善，然曾詢我經像等物何在，我答以二月前在贛州被逐時，堂中諸物皆被掠矣。”⁽¹⁹⁾

在湖廣，穆迪我在德安府建有一座教堂，內有宗教畫裝飾。據“費書”載：“1686年迪我在德安府城建一新堂。(……)而知府親至堂禮救世主像。”⁽²⁰⁾

在廣西，葡萄牙籍耶穌會會士羅佩思(Cajetan Lopes, 1690-1736)曾修復在桂林的教堂，內有繪畫裝飾。據“費書”載：“曾將桂林教堂修復。會雍正仇教事起(……)所修復之教堂立被摧殘。本省總督入堂，毀其祭壇，焚其圖像。”⁽²¹⁾

在西藏，葡萄牙籍耶穌會會士安奪德(António de Andrade, 1580-1634)於1626年修建了西藏的第一座天主教教堂，內部亦有十餘幅宗教畫裝飾。伍昆明說：“教堂內部用十多幅宗教圖畫裝飾。其中有反映聖母生活和基督生活的圖畫，還有耶穌遇難和聖母懷抱嬰孩的兩幅浮雕。”⁽²²⁾1726年9月，聖方濟各嘉布遣小兄弟會在拉薩的住院及教堂成立，內部用許多宗教圖畫裝飾。據“伍書”載：“教堂用許多宗教圖畫裝飾。”⁽²³⁾

從全國情況來看，至康熙六年(1667)全國僅耶穌會教堂就達159所，可想而知，這需要繪製多少宗教宣傳畫、聖像。而且每次全國性教案一發生又有大量的宗教畫被毀。如在1745至1748年間的教難時期，全國的教堂均遭破壞，宗教畫像被焚。據“費書”載：“在1745-1748年間教難遍及全國，正風雨飄搖之時也。(……)教堂、經像、十字架等物被焚，教堂被毀。”⁽²⁴⁾教案過後，需要重繪的量亦是非常大的。

三、作為被贈送的禮物進入中國。西方繪畫有時是作為送給中國君王、要員的禮物來到中國的。

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利瑪竇從南京啟程赴北京，他準備進貢給明萬曆帝的禮品中，就有許多繪畫作品。“貢品中有(……)油畫三幅，內聖母像一幅，聖子耶穌偕施洗約翰像一幅，救世主像一幅。”⁽²⁵⁾

明崇禎十三年(1640)十一月，湯若望為葩槐國(Bavaria)君瑪西利(Maximilianus)所寄〈天主降生事蹟圖〉及蠟質三王來朝天主聖像一座，進呈明思宗。湯若望並將圖中聖蹟，釋以漢語，然後進呈。楊光先《不得已》〈臨湯若望進呈圖說〉引言稱：“若望進呈畫像共六十四張，眾圖四十有八；一圖繫一說於左右。”⁽²⁶⁾

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在清廷服務的法國籍耶穌會會士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奉命出使法國返回中國。他攜來法國國王送給中國皇帝的版畫集一冊。據“費書”載：“法國國王以裝釘華麗之版畫集一冊付晉，囑其轉贈中國皇帝。”⁽²⁷⁾

在西藏，1738年教皇克列門十二世(Clement XII)贈給西藏郡王頗羅鼐的禮物中，有一幅教皇本人的畫像。據頗羅鼐給教皇的覆函載：

您派遣所屬喇嘛攜帶着您的親筆信和許多珍奇物品，一張非常精緻的您的畫像和一些金製禮品來到我處饋贈給我。⁽²⁸⁾

同時，教皇亦給第七世達賴喇嘛贈送了禮品。據達賴的覆函載：

轉交您(……)諸多饋贈禮品，計有(……)一張藝術性很高的喇嘛或是樞機大臣的畫像[樞機主教貝魯加神父的畫像——引者](……)一些教皇、帝王，法國國王、西班牙國王、葡萄牙國王和一些傑出人物的印版像(……)一匹緋紅色的駿馬像。⁽²⁹⁾

四、通過園林壁畫傳入。如意大利籍耶穌會會

士閔明我（Philippe-Marie Grimaldi, 1639-1712）曾為康熙帝的園林繪壁畫。如費賴之說：

有一次在園圍四壁繪人面各一，壁高五十尺，面長如之。正面視之，祇見山林遊獵諸景，第若位在一定地點觀之，則風景沒有人面見焉。（……）所繪一切圖畫，表面視之，似模糊不明，若在一定地點或用圓錐形，圓柱形，角柱形之鏡視之，圖畫畢見，如是之類，舉不勝舉。朝中貴人見之者，咸驚羨不已。（30）

通過這些途徑，西畫逐漸傳入中國，亦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就連教案發生時，踐踏宗教畫亦成了中國政府要求信教者叛教的工具。在葡萄牙籍耶穌會會士黃安多（Antoine-Joseph Henriques, 1707-1748）與意大利籍耶穌會會士談方濟（Tristan d'Attimis, 1707-1748）被殺一案中，就曾這樣。據“費書”載：

仇教者以婦女弱質，不難強之背教，乃以教中聖像置地上，命諸在教婦女以足踏之。諸婦女反向聖像圍拜，刑者以杖擊諸婦女足，仍忍痛禮拜如故。（……）一小時後錄役置天主聖母像於地，命神甫〔黃安多、談方濟〕教民以足踏之。二神甫跪禮聖像。隸役等見安多抗尤力，乃強曳之置聖像上，安多力抗，始止。（31）

由於宗教畫等繪畫作品在傳教活動中作用很大，需求量亦很大，故傳教士們將其大量運來中國。而在中國，貯存它們最安全的地點是澳門。如在1762年耶穌會將被解散之際，大量法國耶穌會貯存在澳門的這些繪畫作品被低價拍賣。據“費書”載：

1762年（……）九月初法國傳教會財產悉被拍賣。（……）餘若法國耶穌會士用重資從法國、印度、廣州等處備置之像章（……）皆以賤價賣出。（32）



來華的傳教士畫家概述

西畫東來，首先是繪畫作品的輸入；其次，隨着繪畫作品的進入，有一批傳教士畫家亦來到中國。他們來華的歷史背景是，當繪畫作品通過上述途徑進入中國後，西洋繪畫作品逐漸引起了中國人的興趣，傳教士們因此感覺到，如果派遣一批傳教士畫家前來，特別是進入宮廷服務，可以促進傳教事業；另外，由於大批教堂的興建和中國民眾的入教，對繪畫作品的需求量亦很大，畫家來華可以滿足這方面的要求。另從中國的情況來看，清朝的一些皇帝對西方繪畫作品亦感興趣，希望召集一些西方畫家入宮為其服務。如清聖祖康熙嗜畫，曾命耶穌會士派遣畫家來華。

對來華的傳教士畫家的研究，目前學術界比較重視的是清乾隆時期入宮服務的、以郎世寧為首的一批傳教士畫家，對他們的研究也較多。本文在此主要是想對這些畫家作一次盡可能詳盡的羅列。在羅列時，像郎世寧等比較有名、研究亦多者祇簡略提及，而將篇幅留給不太有名、研究較少者。請參閱下表。

明清之際來華傳教士畫家一覽表

姓 名	國籍	會籍	活 動 情 況
游文輝 (Emmanuel Pereira, 1575-1630)	澳 門	耶穌會	曾在澳門學西洋畫。利瑪竇臨終 (1610) 時，他曾在其側，為利氏繪像。該像於1614年由金尼閣 (Nicolas Trigault) 攜返羅馬。(法) 榮振華 (Joseph Dehergne, S. J.) 說：“1610年在北京，他協助處於垂危的利瑪竇；1613年在南雄作傳道員和畫家。” ⁽³³⁾
倪雅谷	中 國	耶穌會	據“榮書”載：“1601年作為傳教區的畫師而到達澳門，然後又於1602年7月來到北京。”
石宏基 (Francisco de Lagea, 1585-1647)	澳 門	耶穌會	據“榮書”載：“1610年，本人在上海作傳道員和畫家，1612-1613年在杭州，1614年在南京，1630年在山西絳州，1634年在江西建昌，1645年在海南，然後又到廣東的南雄。”
艾儒略 (Giulio Aleni, 1582-1649)	意大利	耶穌會	1610年抵達澳門。1613年入華。1637年著《天主降生事蹟圖》及附圖《出像經解》，有57幅西洋宗教畫，亦為西化的中國版畫。
盧安德 (Andrius Rudamina, 1596-1631)	立陶宛	耶穌會	據“榮書”載：“1626年到達澳門，後又到達福建福州。”“他在中國繪製的畫像曾被寄往法國。”
利類思 (Louis Buglio, 1606-1682)	意大利	耶穌會	明崇禎十年 (1637) 入華。清順治五年 (1648) 入京。據“費書”載：“以西方繪畫之法教授華人，宮內頗賞其畫法。南懷仁神甫曾在《歐羅巴天文學》一書中，稱其曾以畫三幀呈康熙。其畫全守透視之法，並繪副本三幀陳列於其居宅園中。各處官員來京者見此畫皆驚賞。彼等皆不明緣何在平布上將一切室廊門戶及道路皆能一一繪出。”
海因里希斯·范弗列登 (Heinrich Van Vlieden, 1608-?)	荷 蘭	耶穌會	據“榮書”載：“1644年4月12日乘船出發前往中國。本人為藥劑師和畫師。”
阿爾貝·布拉克 (Alber Brac, 1622-)	荷 蘭	耶穌會	據“榮書”載：“進入初修院，1643年，畫家。(……) 1648年到達澳門學院。”
亨利·沙勿略 (Henri Xavier, 1608-)	比利時	耶穌會	據“榮書”載：“1648年在澳門學院，作為畫家。”
依納爵·拉戈特 (Ignace Lagot, 1603-1651)	弗拉芒	耶穌會	據“榮書”載：“1648年在澳門學院作畫家(……) 是屈指可數的幾名中國傳教士之一，也是澳門學院的著名畫家。”
魏瑪竇 (Vaz Mateus, 1608-1681)	澳 門	耶穌會	據“榮書”載：“他〔1659〕曾在澳門神學院任學監四年，當時正是畫家，同時也為中國傳教區工作，他是‘卓越的畫家’。”
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	比利時	耶穌會	1659年來華，1660年5月9日入京。自謂曾作畫三幅，呈聖祖御覽，並作副本懸堂中，官吏進京者，以一睹為快。

薩克索·伊桑斯 (Saxo Isense)	意大利	耶穌會	據“榮書”載：“1690年為新學修士，準備派往北京宮廷（此人可能為畫家、數學家或醫生）。 ”
比納昔攸斯 (Pinnacius)	意大利	耶穌會	據“榮書”載：“他於1690年被提名為北京宮廷的畫家。”
費約理 (Christophe Fiori, 1672-)。	意大利	耶穌會	據“費書”載：“費約理 (Christophe Fiori) 修士，意大利籍畫師也。1694年至中國，居北京數年。”
衛嘉祿 (Charles de Belleville, 1656-1730)	法國	耶穌會	1699年，與意大利籍非傳教士畫家 Gherardini 抵京，入內廷作畫，他成為首位入宮的傳教士畫家。據“榮書”載：“修建了北京與廣州的住院。1704年在廣州‘為我們教堂繪製了漂亮的圖畫。’ ”
馬國賢 (Mattheaus de Baroni Ripa, 1682-1745)	意大利	耶穌會	他於1710年抵澳門，1711年11月27日離開廣州，1712年2月5日抵達北京，入宮繪畫。
郎世寧 (Josephus Castiglione, 1688-1766)	意大利	耶穌會	1715年抵京，以善畫供奉內廷。
倪天爵 (Jean-Baptiste Simon Gravereau, 1690-1757)	法國	耶穌會	據“榮書”載：“1719年11月左右於北京作為畫家和搪瓷專家。”
利博明 (Ferdinand-Bonaventure Moggi, 1684-1761)。	意大利	耶穌會	據“榮書”載：“到達：1721年9月6日。在北京做畫家和雕刻家，1721年7月24日與費隱共同修建了聖若瑟教堂（東堂，由郎士甯裝飾）。 ”
王致誠 (Jean-Denis Attiret, 1702-1768)	法國	耶穌會	1737年啟程來華。據“榮書”載：“1735年成為北京宮廷的畫家。”
約瑟夫·諾伊格鮑爾 (Josef Neugebauer, 1706-1759)	德國或奧地利	耶穌會	他曾於1739和1750到過澳門。據“榮書”載：“本人為數學家、機械師、天文學家、畫家、音樂家等。”
艾啟蒙 (Ignatius Sichelbarth, 1708-1780)	波希米亞	耶穌會	1745年來華。據“榮書”載：“1745年到達北京。本人為畫家（郎士甯的學生，繪〈乾隆得勝圖〉之一）。 ”
管瑪爾 (Marc Ribeiro, 1719-1774)	中國(?)	奧斯定會	據“費書”載：“入會前曾繪畫；遺有宗教畫數幅，在藝術方面價值甚微，然頗有裨於勸化也。”
安德義 (Joannes Damascenus Salusti, ?-1781)	意大利	耶穌會	〈乾隆得勝圖〉四大作者之一，所作最多：〈庫隴癸之戰圖〉、〈伊西洱庫爾之戰圖〉、〈霍斯庫魯克之戰圖〉、〈烏什酋長獻城降圖〉、〈呼爾滿大捷圖〉、〈拔達山汗納款圖〉、〈郊營回部成功諸將士圖〉等。
圖散·馬松 (Toussaint Masson, 1715-1749)	法國	耶穌會	據“榮書”載：“他是一位準備派往〔中國〕宮廷的畫家。……逝世：1749年7月5日於莫桑比克，他事實上未曾到過中國。”

賀清泰 (Louis de Poirot, 1735-1814)	法國	耶穌會	他為供職畫院的最後一名耶穌會會士。1770年10月20日來華。在內廷為畫師。
穆保祿 (Paolo-Agostino Amoretti, 1739-1783)	意大利	耶穌會/ 巴黎外方傳教會	他是補郎世甯、王致誠兩位宮廷畫家之缺而來華的。據“榮書”載：“1773年11月作為畫家而被派往北京。”
潘廷璋 (Joseph Panzi, 1733-1812)	意大利	耶穌會	1773年，補郎世甯、王致誠之缺抵京。入內廷為乾隆皇帝畫師。據“榮書”載：“到達：1771年。1773年1月12日到北京，本人為畫家。他於1773年繪製了乾隆的畫像。”
卡布里埃爾·格律貝爾 (Gabriel Gruber, 1740-1805)	奧地利	耶穌會	據“榮書”載：“本人既是工程師，又是機械師、化學家、畫家和醫生。1801年(……)……他被派往了中國傳教區，徒勞無益地試圖到達那裡。”

〔註〕本表按畫家入華時間排列，部分被派往中國而在途中死亡或因其它原因未能抵達者及僅在澳門活動者亦列入。資料來源為“費書”、“榮書”及沈定平著《傳教士馬國賢在清宮的繪畫活動及其與康熙皇帝關係述論》、林子昇著《經由澳門傳入中國之西洋美術及其影響》，故引文不再一一注明出處。

從上表可以看出，明清之際共有三十位傳教士畫家來到或試圖進入中國，他們絕大部分是耶穌會會士。從此可以看出，耶穌會在西畫東來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在他們之中，有意大利人十名，法國人五名，這兩個國家的人數佔總人數的50%，可見意、法兩國，特別是意大利（佔總人數的三分之一），是西畫東來的主要力量。

【註】

- (1) 參見林子昇著《經由澳門傳入中國之西洋美術及其影響》，刊載於《十六至十八世紀澳門與中國之關係》（澳門基金會1998年9月出版）；徐新著《明清中西美術交流和郎世寧畫派》，刊載於《東西方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吳志良主編，澳門基金會1994年3月出版）；周正平著《明清之際西洋繪畫在中國衰退的緣由》，刊載於《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3期，頁76-80、102；胡光華著《傳教士與明清中西繪畫的接觸與傳通》，刊載於《美術觀察》1999年第10、11期；沈定平著《傳教士馬國賢在清宮的繪畫活動及其與康熙皇帝關係述論》，刊載於《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等。
- (2) 見（法）裴化行著《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頁166。
- (3) 見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下稱《札記》），中華書局1983年3月出版，頁164。
- (4) 見（明）顧起元著《客座贅語》卷六《利瑪竇》，轉引自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等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五冊，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頁381。
- (5) 見（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

- （下稱“費書”），中華書局1995年11月出版。頁120。
- (6)(7)(8)(9)(10) 見“費書”頁145、頁806、頁240、頁261、頁307。
- (11) 見平托著《安德烈·平托修士給印度耶穌會士們的信》（澳門——廣州，1564年11月30日），刊載於（葡）羅理路《澳門尋根（文獻彙編）》，澳門海事博物館1997年出版，頁88-89。
- (12)(13) 見《割記》頁168。
- (14) 見（明）劉侗著《帝京景物略》，轉引自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等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五冊，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頁218-219。
- (15)(16)(17) 見“費書”頁242頁、頁448-449、頁1038。
- (18) 見胡光華著《傳教士與明清中西繪畫的接觸與傳通》，刊載於《美術觀察》1999年第10、11期，頁80。
- (19)(20)(21) 見“費書”頁301-302、頁308、頁665。
- (22) 見伍昆明著《早期傳教士進藏活動史》（下稱“伍書”），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年11月出版，頁148。
- (23) 見“伍書”頁432。
- (24) 見“費書”頁723。
- (25) 見雅利克著《在印度發生的最令人難忘之事》，卷三，頁936。轉引自“費書”頁38。
- (26) 見林子昇著《經由澳門傳入中國之西洋美術及其影響》，刊載於《十六至十八世紀澳門與中國之關係》，澳門基金會1998年9月出版，頁246。
- (27)(30)(31)(32) 見“費書”頁435、頁370-371、頁370-371、頁752。
- (28)(29) 見“伍書”頁472、頁476-477。
- (33) 見（法）榮振華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下稱“榮書”），中華書局1995年1月出版，頁495。